



人口少子老龄化与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日本为例

.....施锦芳 著



科学出版社

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日本为例

施锦芳 著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全球金融治理与区域经济合作”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第1~3章构成，首先系统地阐述了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理论，并评论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其次总结归纳了全球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并重点讨论了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变化特征。第二部分由第4~7章构成，具体分析了人口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社会保障、财政状况、产业结构、消费状况及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由第8~9章构成，借鉴日本经验为中国政府今后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研究日本经济、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教师或研究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供政府部门从事人口与经济增长以及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制定的管理人员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日本为例 / 施锦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3-042803-5

I. ①人… II. ①施… III. ①人口老龄化—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日本 IV. ①C924.313.4②F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717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徐 倩 / 责任校对：李 莉
责任印制：李 利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字数：260 000

定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施锦芳，云南大理人，2004年、2007年在日本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及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至今多次赴日本东京大学、小樽商科大学、滋贺大学讲学及做访问学者。出版日文学术专著1部，并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日本保险学会《保险学》等日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在《国际贸易》、《日本学刊》、《保险研究》等省级及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2013年，论文《日本人口少子化问题研究》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人口少子老龄化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1.2 主要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3 研究创新、目标及主要内容	12
第 2 章 全球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	16
2.1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及趋势	16
2.2 发达国家的人口少子化状况	28
2.3 发达国家的人口少子老龄化应对策略	34
2.4 本章小结	40
第 3 章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	42
3.1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现状	42
3.2 日本人口少子化的原因	58
3.3 日本政府少子化应对策略评析	63
3.4 本章小结	73
第 4 章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74
4.1 不断膨胀的日本社会保障支出	74
4.2 日本年金保险制度改革	81
4.3 日本看护保险制度改革	88
4.4 日本雇佣保险制度改革	97
4.5 本章小结	103
第 5 章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与财政状况	108
5.1 日趋恶化的日本财政状况	108
5.2 日本消费税改革	113
5.3 日本政府债务危机问题	124
5.4 日本地方政府财政难问题	133
5.5 本章小结	146

第 6 章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与产业及消费状况	153
6.1 少子老龄化下的日本产业及消费结构变化	153
6.2 少子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	159
6.3 少子老龄化对日本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161
6.4 本章小结	169
第 7 章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与城市建设	171
7.1 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城市建设概况	171
7.2 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城市改造措施	174
7.3 本章小结	178
第 8 章 中国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	179
8.1 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	179
8.2 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原因	182
8.3 少子老龄化引发诸多问题	185
8.4 本章小结	189
第 9 章 人口少子老龄化研究的启示与建议	191
9.1 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191
9.2 提高生育率对策	192
9.3 少子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对策	194
9.4 少子老龄化社会的产业及消费对策	196
9.5 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建设对策	198
后记	200

1.1 人口少子老龄化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少子化”一词源自日本，最早出现于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出版的《国民经济生活白皮书》。少子化主要表现在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孩子数量减少等几个方面。少子化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即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与老龄化可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日本将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称为“人口少子老龄化”。从人口学的角度而言，评价少子化的主要指标是人口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总和生育率若低于2.08，将意味着人口逐渐减少^①。老龄化现象指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评价老龄化的指标是老龄化率，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当这一指标达到7%，则标志着该社会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老龄化率为14%时，则说明这一社会已经是老龄化社会。

就全球而言，人口少子老龄化是当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及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日本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下降，1990年的“1.57危机”后，日本政府拉开了与少子化作战的帷幕^②。1997年，日本首次出现了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现象。近20年过去了，少子化现象在日本未得到改善，反而日趋严重。日本社会从1899年起开始进行人口动态统计，到2005年时日本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记录。日

①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www.who.int/en/>。

② 1990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1989年的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的惊人数字，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

本的人口问题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①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26，还达不到2005年世界平均水平(2.60)的一半；②2005年日本的总人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了自然减少的现象，即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口，这意味着日本社会迎来了人口逐渐减少的时代^①。2006年，日本在人口3000万以上的37个国家中老龄人口比重最大，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国际社会通常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7%增加至14%所需要的年数定义为人口老龄化进展速度。通过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展速度可知，法国人口老龄化进展速度最缓慢，花费了115年，进展速度较快的是德国，用了40年。然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率在1970年达到7%，1994年即增至14%，其间仅用了短短24年，成为全球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

严重的人口少子老龄化将对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的增减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兴衰的重要变量，在一个坐标轴上，假设经济增长率为 Y ， X 是资本的投入， Z 是劳动力的投入，如果未来劳动人口的投入下降，而其他两项的比例提高，那么生产总量也将下降。目前，随着日本年轻人口的减少，劳动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约0.7%的负面影响。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至今，日本可谓进入了“失去的30年”，即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不断加剧的人口少子老龄化是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也成为日本政府现在及未来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人口少子老龄化在延长人均寿命方面有着积极的一面，然而，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随之加剧，将对劳动、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财政、消费及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中国和日本两国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两国的社会经济变迁面临的问题却非常相似。中日两国都可谓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现今的人口及经济变迁与曾经的日本十分相似。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相当于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两国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1956~1973年日本经济的18年高速增长创下了奇迹。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更使世界为之震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重新规划了经济发展蓝图，将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战略方针。同时，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都非常迅速，总和生育率都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同属于低生育水平国家。中国正逐渐迎来人口少子老龄化时代，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少子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2013年开始逐渐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但是，未来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增加带来的人口结构恶化是中国政府必须应对的难题。因此，研究

^① 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w.cao.go.jp/>。

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找出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立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本书对解决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及现实意义,同时对推进“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及“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及应用价值。同时,本书对丰富和发展人口规模、结构改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理论的创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主要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人口学角度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少子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标志。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而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更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的国家出现人口增加,而有的国家却面临人口减少。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就需要按一定的标准来调控人口总数量。

研究人口问题时,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展开讨论较为妥当。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没有限制,人口呈指数速率(即2, 4, 8, 16, 32, 64, 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即1, 2, 3, 4, 5, 6, 7等)增长。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和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马尔萨斯(2008)以人的性本能几乎无法限制和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这两个假设为前提,围绕人口问题提出了八个主要观点:①人口数量严重受限于生存手段;②当生存手段增加后,人口也相应增加;③人口压力刺激生产增长;④生产增长反过来也刺激人口增长;⑤从长远来看,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⑥性、劳动和子女等影响人口和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由个人的收支决定所影响;⑦当人口增长超过供养能力时,正面的抑制因素会发挥作用;⑧这些抑制因素的本质将对生物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同时,马尔萨斯还提出了决定人口增减的三个因素:①生活资料;②与死亡率有关的疫病、战争、医学发展水平等所谓的积极阻止因素;③与出生率有关的控制、管理避孕、堕胎、婚期、道德等所谓的预防阻止因素。由于在积极阻止和预防阻止的相关因素为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将依存于生活资料,因此可以将马尔萨斯的观点归纳为马尔萨斯人口假说:①当平均生产力大于最低生活水准时人口数量将

增加；②当平均生产力等于最低生活水准时人口数量保持不变；③当平均生产力小于最低生活水准时人口数量将减少。根据上述假说，最低生活水准应该是可以进行人口再生产的生活最低保障，对此观点也有很多争论。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不只是生理上可以满足和保障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而且还需要满足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的最低限度的需求水平。因此，这就成为了包含其生产能力的社会诸条件的函数，不是都固定在绝对水平上的东西。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达，收入水平较高，最低生活水准也很高，由此人口呈现出减少的倾向。与此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水准也很低，因此人口呈现出增加的态势。要维持人类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控制人口过速增长的措施必不可少。控制人口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调控。发达国家由于有人口出现少子老龄化倾向，因此应采取与之相反的措施，即提高出生率，增加人口总量。无论引发少子老龄化的原因如何，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均意味着该社会步入了不健全状态。因此，少子老龄化成为人口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2.2 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的数量、结构改变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研究成果指出，人口规模加大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有些研究成果则强调，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劳动力、资本、技术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的视角展开。

1. 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扩大带来个人平均所得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为“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社会生产成本降低；②劳动力人口年龄比较年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则能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③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较轻，能完成财富快速积累。因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然而，人口红利并不等于经济红利，这只是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优势，只有有效地利用这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随着年龄结构的继续改变，将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优势向劣势转变。

下面以日本为例考察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1956~1973年日本经济得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农村大量的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大量流向了更具有增长潜力的工业部门，这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带动需求最终实现了经济整体高速增长。换言之，大量的劳动投入不仅从供给角度促进了增长，而且扩大了需求，从而带来了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口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实际上，人口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不但在日本，而且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得到了验证。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之，劳动力人口减少即劳动投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 资本与经济增长

资本形成来源于生产剩余，即储蓄，再由储蓄转化为投资。根据国民收入计算，储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因此，当期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源于上一期的人口总产出与消费的结余(即储蓄)。因此，储蓄积累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丰富。人口的少子老龄化现象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关于人口变化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源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代表性消费者将根据他所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把各个时期的消费安排在合理稳定的数量上”。生命周期理论是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年龄与储蓄率变动的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少年人口是净“借贷群体”，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老年人口则是消耗劳动年龄阶段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换言之，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生产小于消费，而具有抚养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是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因此，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可能影响储蓄率变动。索洛(Solow, 1994)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寇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 1958)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后指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及总和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较重，消费需求增加而储蓄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少儿抚养负担将演变为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增加，储蓄也将增加，最后，人口转变表现为巨大的老龄化负担，削弱了储蓄能力并使经济增长减速。

3.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广义的技术进步指的是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增进。而狭义的技术进步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主体所生产的产品或工艺的变化情况。技术进步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为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及创新开发新产品。罗默(Romer, 1986)、卢卡斯(Lucas, 1988)等提出了新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不是依赖于投资，而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率，并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加则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有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经济则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如果

进一步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的产物。

到目前为止，有关人口转变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长期来看，传统人口再生产向现代人口再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必然推动技术进步。然而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具体影响却很难确定。有研究成果指出，老龄化下，人口数量、结构转变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但对于具体的影响路径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老龄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下降，以至于诱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从而削弱了技术进步及劳动力市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加大技术创新，从而推进技术进步。另外，也有其他观点指出，人口老龄化将诱发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从而潜在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看，它确实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劳动者是技术进步的实施者，可见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的数量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在人口少子化时代，劳动者的数量将逐渐减少，因此，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人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实施者，而技术进步也离不开人来完成。因此，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实现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技术进步除了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外，还被人口结构等其他诸多因素所左右。

4.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刘易斯(2005)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两部分：①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②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在一个国家中，经济体制就可以视为社会知识。因为一个适合国情、符合经济形势的经济体制可以较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在度量国民的“幸福度”时，通常不采用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采用人均GDP。在现有的资本存量(capital deposit)下，即使劳动力人口减少，但今后随着人均资本密集度(capital intensity)的增加，人均GDP也会增加，个人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高。并且，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将有所提高^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围绕经济增长率展开了多种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日本不进行年金(日本的年金相当于中国的养老金)改革也不提高劳动参与率，那么日本未来的经济增

^① 全要素生产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长率将低于美国, 仅能维持在1%左右。相反, 如果日本进行年金改革并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 并能很好地控制财政支出及减轻经济负担, 那么日本的GDP增长率将有可能接近或略赶超美国, 达到1.5%。与美国不同, 日本的最大特征是: 如果不进行包括年金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那么日本GDP的增长率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也说明, 日本还有通过改革年金制度以减少对储蓄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有效利用女性劳动力资源等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余地。另外, 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能控制储蓄率下降, 并促进资本积累及提高资本密集度。

1.2.3 人口少子老龄化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存环境改善、死亡率下降、养育孩子观念改变等导致人口发生变化, 而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变化同时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根据人口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 将人口转变过程分为人口负债和人口红利两个时期, 少子老龄化阶段就是指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负债的出现一般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人口转变早期, 少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 而老年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比较容易形成人口年轻化态势, 结果造成总抚养比中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拖累了经济增长的步伐。然而少年儿童是潜在的生产者, 是今后劳动力的来源, 可以增加今后的劳动力供给, 对经济增长具有推进作用。人口转变的后期, 少年人口数量下降, 老年人口规模迅速膨胀, 总抚养比中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 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支出(如老年人的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大幅度上升, 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 导致总产出和国民收入下降。总之, 这两个时期经济生活中生产人口减少而消费人口增多, 以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口少子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机制主要通过消费与储蓄、投资、国际收支、技术进步等途径传导。

1. 少子老龄化影响消费与储蓄

关于少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少子老龄化下消费会明显增加或减少的现象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论证, 从不同的角度看似乎表现也不同。首先, 从宏观角度来看, 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非劳动人口, 退出劳动力大军, 劳动力人口减少而消费人口增加, 这势必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大负担。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是老年抚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高龄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 使得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逐渐增加, 而用于积累的部分减少。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单个家庭的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家庭的整体平均收入水平,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均消费水平的下降。其次, 如上文所述, 老年人的养老、护理和医疗都需要大量的支出, 家庭消费还需向老年人倾斜, 这使家庭其他消费成员的消费水平进一步降低。最后, 出生率的下降带来了人口的减少, 导致国内市场逐渐萎缩, 原来受年轻人欢迎的消费产品和服务

行业因年轻人口减少也不得不缩减规模。

人口少子老龄化下，储蓄也会发生较大变化。上文所述生命周期理论指出，每个人根据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个人的储蓄倾斜不同，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倾斜为正，退休后储蓄倾斜为负。所以在短期内，当社会中老年人口比重提高时，对储蓄是不利的。实际上我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老年人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储蓄水平会更低。而在长期内，人们预期自己的生命时间延长时，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他们会在年轻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便为步入老年期时的消费做好准备。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年轻人口的数量大于老年人口的数量，从长期角度看，储蓄又会出现增加的趋势。

2. 少子老龄化影响政府和企业投资

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两大块。政府投资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和国债收入。从政府支出层面看，人口减少相当于纳税者人数的减少，长此以往政府财政将陷入税收大量减少的窘境。不断攀升的人口老龄化率迫使政府的医疗、养老和护理等社会保障支出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如果政府想保持投资不变或增加投资，有可能选择的方法是提高税率水平以增加税收收入或是增加发行国债。

企业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如上文所述，短期内，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储蓄可能会减少，而在长期内，储蓄水平有可能上升。从企业支出层面来看，一方面，人口数量减少与人口结构恶化会招致国内市场萎缩，内需主导型企业的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近年，伴随少子老龄化的加剧，日本日用品、家电和成衣等内需型连锁企业在缩减国内工厂规模的同时纷纷制订海外市场发展计划以及加大与国外同行合作的力度，在海外寻求发展空间，把公司的未来寄希望于海外市场。例如，日本大型连锁商优衣库于2009~2012年的三年间就在亚洲增设了300多家店铺，还计划继续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建立超大型店铺，预计到2014年年底，海外销售额将超过日本国内销售额。丰田、日产、本田等日本汽车制造企业也将新工厂逐渐转移到人口持续增长且购买力旺盛的发展中国家，这三家企业已经连续10年未在日本国内增设新工厂。另外，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如松下电器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的普通职工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40岁。老龄化导致的高成本使多数公司的收益呈下降趋势，员工的老龄化导致企业的创新能力及拓展欲望也有所下降。因此，日本企业购买新设备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逐年减少。

3. 少子老龄化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学者们利用一些国家国民储蓄和投资率的数据，统计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

这些国家经常账户平衡的影响后发现,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里,更倾向实现经常账户盈余。如上文所述,长期内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里,储蓄会增加,并使本国的资本相对充裕,国内利率相对低下。根据利率平价理论,本国资本将会流向利率水平相对高的国家。因此,本国将成为一个“债权国”,对国外的净投资收入将会增加,提高了经常账户项下的收入账户盈余。同时,长期内由于储蓄的增加,私人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企业投资会不断增长,而少子老龄化导致本国国内市场相对减小,于是国内企业将更多的产品输出海外。

4. 少子老龄化影响技术进步及制度创新

少子老龄化下,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的老少比例失衡,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也相应提高。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年轻劳动力的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及提升国际竞争力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诸多数据表明,人口少子老龄化下,日本多项技术指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下降。从经济总量看,日本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然而日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居亚洲第三位,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仅居亚洲第五位。从每万人拥有电脑的数量看,美国大约是日本的两倍。而从全球国际竞争力排名看,1993年日本人均GDP跃居全球第二位后,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连续8年蝉联全球榜首,然而1994年日本人均GDP下降至第三名,之后持续下滑,2013年日本人均GDP退居全球第十七位。日本人均GDP在亚洲长年居首位,2007年被新加坡赶超落至亚洲第二位。可见,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减少通过技术途径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1.2.4 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1. 对日本财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近年,日本社会保障费递增引发财政状况恶化成为了少子老龄化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日本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了日本国民关注的焦点。现今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可归纳为两大方面:①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付金额逐年增加;②人口少子化使得为社会保障制度保驾护航的财源日益枯竭。

2013年日本国债余额高达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为201%。从国债的总规模及GDP的占比看,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考验。少子老龄化下,社会保障支出还将进一步增加,虽然日本制定了中长期财政健全化目标,然而目前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大部分仍然需要靠发行国债来弥补。因此,今后财政机制健

全、社会保障收支标准、税收及国债制度等多项改革就成为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伴随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加剧，近年日本政府加速推进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步伐。日本2000年导入了看护保险制度，2004年对公共年金保险制度进行改革，2006年又着手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少子老龄化下社会保障支付额度的增加及各年龄段人口间负担的差距，使得人们对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为今后日本政府的重大应对课题。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的问题不仅是不同年龄段人口间的问题，而且还与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假设少子老龄化社会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管不同年龄段人口会出现负担额度的差异问题，但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还比较容易维持。但是，国民负担率的上升会通过抑制消费和储蓄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现实中，当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陷入负增长时，不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会导致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崩溃及医疗保障体系的质量下降。人口少子老龄化下，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年金、看护、雇佣等社会保险及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的支出会不断增大。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与老年人相关费用的份额将大幅度提高，势必限制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影响生产部门的资本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加重国民经济负担。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保障水平均处在亚洲国家的前列，在年金、医疗、就业扶持、生活保护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经济发展迟缓、少子老龄化日渐加剧等原因，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资金筹集不足和给付压力增大的两难困境。特别是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持续低迷，GDP从2008年起出现了负增长。同时，少子老龄化逐年加剧不仅对日本的综合国力产生负面影响，也对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较大冲击。根据2011年日本厚生劳动白皮书的资料，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从2001年起出现了积累额逐年减少的情况。倘若不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不仅国民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将出现“空洞化”的状况（即低收入者无法参保或者中断缴费），未来社会保障财政也将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建立安心有活力的社会为主要方针，对社会保障和财税体制进行一体化改革，主要是强化社会保障机能、稳定资金来源、调整给付水平，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构筑面向21世纪，人人放心且充满活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体系。

2. 对消费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中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米勒和莫迪格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霍尔的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等。凯恩斯(1983)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最先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并详细探讨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消费和收入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消费函数或消费倾向,现期实际消费是现期绝对实际收入的函数。杜森贝利(Duesenberry, 1949)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阐述了相对收入假说,并且杜森贝利认为,消费与收入之间在长期和短期内存在不同的关系。长期内人们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均匀消费,短期内的消费则会在前一阶段累积起来的自发消费基础上根据现期收入水平而均匀增加消费。并且杜森贝利还进一步地分析了长期和短期消费的不同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两种因素,即“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弗里德曼(Friedman, 1957)在《一种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该理论是在跨期消费选择的微观理论基础上推导出的。该理论认为,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并不是根据他的现期收入做出的决策,而是根据他的持久收入做出的选择。消费者的持久收入是指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性收入,通常可以根据所观察若干年的收入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求得,距离当前时间越近的年收入水平权数越大。米勒和莫迪格利亚尼(Miller and Modigliani, 1961)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是传统的消费理论中唯一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会存在显著差异:①处于年轻时期的消费者收入水平一般偏低,会出现透支消费的状况;②进入壮年和中年以后,收入会日益增加,这一时期的收入会大于消费支出,而较高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偿还年轻时透支消费的债务,而且还可以积攒收入以供未来养老所用;③当消费者退休进入老年阶段时,收入大幅度下降,消费又会超出收入,形成负储蓄状态。上述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阶段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发展阶段的消费函数究竟用哪一种消费理论来解释更合理、更适用,必须通过实际的经济数据来加以检验和实证分析。上述理论基本以收入为影响消费的中心变量,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则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有关少子老龄化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中,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秦朵(1990)根据动态建模理论,建立了中国居民总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1952~198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韩立岩(1998)运用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年度数据和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季度数据,做了不同制度时期的协整检验;孙凤和易丹辉(2000)在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对中国城镇消费函数进行了研究。

3.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增加,与此相关的消费市场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相关产业随之改变。日本贸易会月报和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通过分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日本消费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后指出,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因此与